122810

Bandjer，或名Barito，原註謂是處多盜，必指Badjos人，此名應係明史中著錄之賈哇柔（見文郎馬神條）之對音，亦即美啞柔也。入港便是文郎馬神國（Bandjermasin），今稱馬辰，「文郎」二字，殆Bandjer之訛讀歟（按閩南人讀「文」曰Bun或Boon，「郎」曰Long）？

五　結　論

綜合上論，出余所考，實甚有限，苟不借鑑西方學者之著作，更不知從何着手，興言及此，能不慨然。英國此次所遭浩刼，並不亞於中國，然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之著名刊物（Bulletin），迄未中斷，內容之精，印刷之美，無異往昔，僅數量減爲年出一册而已，我人對之，作何感想。吾想國家之强，是多方面的，軍事、政治、經濟固極重要，但學術亦不應任其沒落。遠者不必言，姑言其近者，則自二十世紀以來，任何國家之隆替，幾莫不視學術之盛衰以爲斷，彼孜孜爭利，孜孜逐色之國家，而能見重於世界者，尚未之聞也。末繫以辭曰：伊誰之責，伊誰之咎，返國三年，思之不得。

本文屬稿時，承孫宕越先生供給閩粵地圖，胡盡善女士代繪針位圖，附此誌謝。

十七八世紀中國學術西被之第二時期

方　豪

一　引　言

十七八世紀時歐洲學者對中國之研究，即一般人所稱爲「漢學」或「中國學」（Sinologia）者，大致可分爲二期：第一期之研究者爲最早來華之教士，若利瑪竇（M.Ricci），若艾儒略（J.Aleni）等，國人類略知其概。惟第一期爲啓蒙期或發凱期，自難望其有鉅大之成就，故欲窺彼時我國學術西傳之蹟，不可不注意於第二期之研究經過。但此一時期之歷史，已往論及者不多，國人對之亦頗茫然。本文即旨在彌此缺憾也。

二　繆勒與戴倍洛之努力

第二時期有一最顯著之特徵，即第一時期之研究者盡爲出家人（傳教士），至第二時期乃始有在俗人（非教士）加入工作。

最先廁身於漢學區域內者爲著名德國東方學專家繆勒（Andreas A. Müller）（一六三〇—一六九四）。繆氏少時曾遊美國，爲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發起人之一。留英十載，得希德（Hyde）氏之啓迪，攻習中文。至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學習中國活字排版術。最後仍返回德國，所學遂益成熟。著有馬哥孛羅遊記訂誤與中文索引（現藏柏林圖書館）及「一六九五年之若干東方著述」（Opuscula nonnulla Orientalia 1695）與「一六八五年之中國範本」（Specimi-num Sinicorum 1685）。（以上二書名均據拉丁文直譯，作者何所取義及書名之原義，因對原書未曾寓目，不敢臆度，故不能有較確之譯名。）前書出版於一六九五年，書中並包含有一六七七年在柏林初次問世之阿勃達拉氏「中國文」（Abdallah Beidawaei Historia Sinensis），作者附有註解，且將前人研究所得亦一併採入，如：「中國之地理立名」（Geographicus imperü Sinici nomenclator）及「中國古蹟史」（Monumenti Sinici historia）（一六七二年出版）；爲使其書臻於美備起見，乃更將基爾旭（Kircher）氏所作之金石

122811

學圖表說明亦附於後。阿勃達拉所著波斯史及中國史，繆勒亦爲譯入拉丁文；其時東方學之研究尚在搖籃期，自繆氏之書出，乃大爲發揚，功亦鉅矣。凡致力於研究中國者，受惠尤深。此其同時人法國皇家學院教授戴倍洛(Bart d'Herberot)氏對彼稱頌語，非溢美也。繆氏縱不諳中文，然於阿拉伯、波斯、希伯來諸文固無不精通暢曉。其傑作「東方文庫」Bibliotheque Orientale 亦名「東方各民族學識百科辭典」，實可與特吉尼(J. de Guignes)氏之著作相頡頏。特吉尼爲十八世紀獨步一時者。戴倍洛之著作，最爲天方夜譚之刋行者伽郎(Ant. Galland)氏所心折，戴氏既下世，伽氏乃爲之付梓。伽氏除曾將阿勃代爾來薩(Abdelrezzac)之「二星之顯現」及米爾貢(Mirkhond)之「波斯史」譯爲法文外，並嘗計劃編撰「鐵木兒系諸王列傳」及「成吉思汗傳」，然未能持之以恒，終歸泡影。戴倍洛之著作曾重版多次，其在一七七七年及一七八二年刋印於海牙者，尤爲完備，蓋曾經萊德(Leyde)大學勒斯克(Reicke)大學及萊勃齊(Leipzig)大學教授許爾登(Schultens)氏爲之校閱也。

戴倍洛氏爲便於研究學術起見，嘗退隱於篤斯加(Tosoane)，後爲首相郭爾倍(Colbert)所邀，俾就東方學術之研究，草擬計劃，奏陳國王，蓋首相對此頗感興趣也。郭爾倍首相之企圖或非純粹學術的，超然的，蓋此種研究實大有裨於建立大西洋以外之國際關係及促進商務之發達也。彼在生時嘗鼓勵中國語文之研究，並贊助增派法國教士來華之計劃。郭氏未及目覩其計劃之成功，賫志以歿。乃由羅伏亞(Louvois)促成其實現。羅伏亞首相嗜天文地理之學，曾以郭爾倍氏在一六六〇年成立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多人，分別遣往歐美各地；中國方面則以此事付託於教士。

三　來華研究之五教士

負此等研究中國學術使命之教士共五人，皆飽學之士，尤以數學擅長。五人名爲洪若(亦作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李明(Louis Lecomte)，劉應(Claude de Visdelou)，白晉(Joachim Bouvet)及張誠(Jean-Fr. Gerbillon)。五人以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陽曆二月八日（以下皆作陽曆）抵北京，惟被留供職宮廷者僅白張二人，餘則遣往各省。李明初居山西，康熙二十八年曾在該處觀察彗星之軌道並研究水星之運行；此後即在中國境內遊歷多處，五年內達八千公里。洪若則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偕畢嘉(Jean-D. Gadiani)赴南京，致力於傳教事業。（譯者按：次年二教士即曾至江寧織造局覲康熙帝，織造局亦即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先世之官署。）李明曾奉召回羅馬，報告關於敬祖問題之辯論。乃乘留歐之機會，於一六九一年至一七〇一年在巴黎刋行其「中國現狀新同憶錄」(Nouveaux Mémoires sur Petat Present de la Chine)三巨册。其書樸實無華，而行文則極流暢；又有「中國禮節論」(Sur les Cérémonies de la Chine)一書，則獻呈梅納(Maine)公爵者，一七〇〇年出版。一如其他熟悉中國人心理者，引證事實及理由，以支持敬祖之舉，而神學理論家則加以駁斥。李氏二書遂亦爲巴黎大學激烈攻擊之對象。

劉應精究中國文學，故專攻匈奴、突厥、中國及蒙古史。彼發見戴倍洛書中有關中國歷史部份，頗多闕誤，則以戴倍洛氏不諳中文也。劉氏乃發願盡譯彼所能搜集之上述四大民族書籍。於是乃研究馬端臨之文獻通考及其他典籍多種，撰成四册，寄往歐洲。惟其書旋即失踪。然特吉尼氏（一七二一—一八〇〇）曾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韃靼全史」(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 Tures, Mongols et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或知有劉應之書，並加以利用，蓋劉氏爲此項歷史學之前驅，故吾人頗有理由懷疑；然特吉尼致德物諾(M. Thévenot)函中，但稱道其本人著作，而不提及劉氏之書也。劉應更有一書曰「韃靼史」(L'Histoire de la Tartarie)，附於戴倍洛書後（海牙版），去特吉尼書之問世已二十年；書中有景教碑之譯文，爲卜彌格(Boym)所已翻譯者，惟劉譯乃更正確耳。

惜一七〇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劉應即已離華；苟能在華多留數

122812

年，則在漢學上必更有創獲。張誠與白晉，均遵康熙之旨；專攻滿文。康熙對二人及徐日昇(T.Peveyra)頗爲信任，曾命參加對俄交涉，訂立尼布楚條約。迨俄國使臣入京覲帝，三教士亦隨班入朝，並以義大利語與俄國使臣交談。後洪若回法，乃留張誠在華，時爲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也。張誠曾八次隨侍御駕至蒙古，第五次乃偕康熙往晤某王公者，第八次則同往觀察一新攻佔之地。其遊記逸趣橫生，俱被收入杜赫德（Du Hakle)之「中國與中國韃靼之史地紀年政治及物產紀述」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出版錢德明 J.J. Marie Amiot 著「滿文法」(Grammaire tartare-mandchou)然其書僅修正張誠所著「大韃靼之歷史研究」(Observations historiques sur la Grande Tartarie)，張氏實西人之最先刊印滿文文法者，其功不可泯也。當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白晉回法時，康熙帝曾囑其再羅致博學多識之教士來華，並託渠攜書四十九册獻呈法王路易。此等書籍卽被藏於皇家圖書館。其時館中僅有中文書四册，爲路易十四之大臣，紅衣主教瑪薩林(Mazarin)所贈者。白晉曾印行二書：一名「中國近況」(Etat present de la Chine)，一名「中國皇帝之歷史眞相」(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次年卽回中國，乃專事研究中國輿地，測繪地圖，因多年勞瘁之結果，得於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七）以一統輿圖進呈於帝。其寄回法國之各項報告，亦爲人所珍視；而杜赫德之鉅著採用其材料尤夥。

洪若略諳醫學，曾以金雞納療治康熙帝之惡性瘧疾。凡三次回法，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亦曾攜書回法，書存於皇家圖書館；最後一次返法時，彼乃以中國字典十二册贈該圖書館，而第一部滿文書之進入歐洲圖書館，亦在此時。洪若之報告盡載於雷哥皮恩(Legobien)及杜赫德合編之「國外教會之感人奇趣通訊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éres）之第七八兩册，其他各册亦時見引述云。

四　杜赫德與雷哥皮恩之成就

杜赫德（一六七四——一七四三）氏雖不諳中文，然以其畢生努力，對漢學之研究實有其不可磨滅之功績。雷哥皮恩（一六五三——一七〇八）曾致力搜集國外傳教士寄回之報告，絡續發表於上述之通訊集，氏卒後，杜赫德乃起而繼其未竟之業。其書第九至第二十六各章均經其親手校改；全書尚有一重印本，則爲蓋倍弗（Guerboeuf）所訂正，而按各信所發出之地域編纂。

杜赫德之「中國……紀述」（全名見上），凡四巨册，以一七三五年出版，最受歡迎，不久卽有多種譯本。一七四三年英譯及德譯本問世。一七六三年海牙發行新版，增入頗多；英譯本以未經校訂故爲人所棄。反之，德文譯者拜耳（Gottliel Siégfried Bayer)（一六九四——一七三八）則通曉中文，曾歷任各大學教授，爲當時傑出之東方學專家，後乃回返故鄉肯尼堡（Koenigsberg），在城內圖書館工作。一七二六年爲新成立之彼得堡皇家研究院所延致，被任爲教授，主講希臘羅馬之考古學。對於中國方面，則遺有兩大著作：

一、「中國大觀」(Museum Sinicum)，一七三〇年出版，二册。計有中國紀年，中國衡量度制，及韃靼匈奴蒙古史，大約取材於劉應之稿本。

二、春秋節譯。

五　王代孟特與傅爾孟

十八世紀之漢學家尚有可資稱述者二人：一爲王代孟特（Vandermonde)(一七二七年生於澳門，一七六二年卒於巴黎）；著有「醫藥材料」(Materia Medica）一書，討論中國醫術，稿本現存巴黎。其次爲傅爾孟(Et. Fourmont）（一六八三——一七四五），遠勝於前者。傅氏早年喪親，攻讀於馬薩林學院，被任爲安登(Antin）公爵之

122813

家庭教師。

時巴黎外方傳教會之教士，四川梁主教(Artus de Lyonne)(一七一三年卒)，曾攜一福建人(Arcadius Houang)黃姓(譯音)(一六七九年生，一七一六年卒於巴黎)來法。路易十四聞傅爾孟有語言才，令從黃君學習。師生二人乃合著「華語啓蒙」Rudiments du Parler Chinois。

一七一五年傅爾孟以東方學專家之資格，繼伽郎氏之後，在法蘭西學院教授阿拉伯文；又以多來盎(Philippe d'Orleans)之敦促，兼授中文讀法及中文文法。傅氏乃在其文法書第一卷中發表漢字之二百十四部首。彼並有志刊印十萬漢字；此事在當時歐洲印刷所中，頗感技術上之困難，然賴安登公爵及皇家圖書館館長皮農神父(Abbe J-P.Bignon)(一六六二——一七四二)之臂助，卒能將其文法中之讀音部份發表，書名「中國默思」(Meditationes Sinicae)，時在一七三九年。逾二載，教士吉尼(Guignes)自中國返法，奉安登公爵命，校閱傅氏所撰中國文法，然彼竟不敢加以批評，但有稱奇而已。於是傅氏在一七二八年即已完成之「中國文法」(Grammatica Sinica)，乃得於一七四二年刊行問世。

萊姆薩(Abel Rèmusat)在其所著「韃靼語研究，滿州、蒙古、畏吾兒、西藏文法及文學考異」(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en Mémoires sur differents Points de la grammair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Mandchous des Nongols des Ouigours et des Thibetaiens)序中曾證明傅氏此書實爲多明我會士萬濟國(Francisco Varo)氏以西班牙文所著中國文法書之節譯。萬氏以一六五四年至中國，一六七三年(?)在廣州刊行其「官話法」(Arte de la lengna Mandar)；其書凡六十四頁，其中五十頁爲官話，附以西班牙文注音；其書不無價值，然知者甚鮮。傅爾孟乃認爲無說明來源之必要，然剽竊抄襲之嫌，固不能免也。

六　馬若瑟

一六九八年三月七日白晉之返華也，率同教士十人，就中馬若瑟J.-M.de Prémare)(一六六六——一七三六)巴多明(D.Parrenin)(一六六五——一七四一)及雷孝思(J.B.Régis)(一七三八年卒)三人，頗可一述。

馬氏入華後，居江西饒州，攻漢文，與白晉及傅聖澤(J.F.Eouguet)(一六六三——一七四〇?)合編「中國史紀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historiae Sinicae)一七二四年羅馬出版。

一七二〇年馬氏被召至羅馬，在教會員司前辯護，蓋氏因研究易經、道德經、及淮南子，乃認爲天主教之必信教理，俱可於上述各書得之，而尤以孔子之「經」中蘊藏最富也。

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大部份時間之來華教士以求得語言，地理及歷史之普遍知識爲限，十八世紀之教士則進而研究哲學。馬若瑟著有「書經以前時代及中國神話之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temps anterieurs à ceux dont parle le Chou-king et sur la mythologie Chinoise。宋君榮(A.Gaubil)所譯書經，爲語言學上之名著，吉尼氏爲印行其第一編，而以馬若瑟所著論文附焉。馬若瑟之「漢文簡記」(Notitia lingual Sinicae)亦值得一言。此爲當時西人所作漢文文法書中之較優者。其書與傅爾孟所著者迥不相同，傅氏竟稱其不過爲一普通文法書，然馬氏所收罕見之例，多至一萬二千則，至少須有五萬字方能全部印出。其所以終於不能列入文法書內者，即在此印刷上之困難。自一七二七年後，馬若瑟即與傅氏互通言訊，且絕不自私，以本人之著作供傅氏參考。

一七二八年馬氏即以「漢文簡記」之原文稿本贈傅爾孟，適傅氏譯萬濟國之文法書，乃同時修改馬氏之稿本，並揚言「漢文精義在二書中俱已正確指出，惟予所作者乃在二書之上。」(序文中所言亦同)當傅爾孟剽竊二書，成爲自己之著述，而公然付印時，馬若瑟已

122814

瞑目而逝。然馬氏晚年與傅氏之關係，已不如前此之深摯矣。蓋一七三三年十月十五日馬氏曾自澳門致函傅爾孟，明言其並非不知傅氏襲用其書，惟不應將馬氏之書延遲出版耳。馬氏所以願以其本人著述寄與傅爾孟者，固亟望傅爾孟早日爲之刋印也。苟傅爾孟願研究其著作，彼必非常感激，且馬氏對傅爾孟亦有相當信託，故以稿本寄彼閱讀，但馬氏並無意交彼一人，而實欲使愛讀漢文之西人咸沾其益也。

傅爾孟不忠於友人之信託，亦未發表其稿本，直至萊姆薩在皇家圖書館發見馬氏抄本，始在其「漢文初級文法」Ele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中爲馬若瑟留一席之地。於是馬氏之名，乃晦而復彰。

馬若瑟又賴另一教士之助，著有拉丁中華字典，但此書是否傳至歐洲，則不可考。

此外，傅爾孟所交與皇家圖書館之書籍，其中一部份實出馬若瑟所贈，如十三經及元人百曲，「趙氏孤兒」即其中之一也。此書曾由馬氏爲之迻譯，杜赫德亦收入其鉅著中。譚維斯（Davis）又譯爲英文，然福祿特爾(Voltaire)作「中國孤兒」(Orphelin de la Chine)一書時，固早已採作題材矣。

杜詩精義

邵祖平

王伯厚有言曰：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杜甫之詩爲後人宗仰誦習者久矣，杜牧贊之曰：天外鳳凰誰得髓，人間空解續鸞膠。蘇軾贊之曰：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夫曰髓曰骨者，其狀杜詩之精義，可謂至矣。然不如杜甫自狀其詩之爲愈也。杜詩云：詩興不無神，又云詩成若有神，又云詩應有神助，又云文章有神交有道，其言神者屢矣。蓋神者，義之精也。詩之入神者，故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舖陳終始者，不爲多，曲江三章章五句之獨寫胸臆者，不爲少，不效四言，不倣離騷，不用樂府舊題，不爲創，風雨詠舟前落花偶然似王楊盧駱之初唐體者，不爲襲，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者，不礙爲古詩，杈枒瀩爛高聲硬語者，不礙爲絕句。神無長短，無多寡，無內外，無古今，無厚薄，無方圓，其來也不知其所從來，汪洋混浩，千彙萬狀，隨形寫貌，遇事瀝心，排天斡地，倒江竭海，出入元氣，與無始遊，杜甫豈徒千古之詩人冠冕而已哉！使其用世，則可爲禹稷伊呂，依聖則可爲顏閔游夏，嬉放則可爲漆園傲吏，怫鬱則可爲湘纍孤臣，其術其道，雖吾不知，其神則固相似也。至言文學，六經則以理爲文，諸史則以事爲文，莊子則以意爲文，諸子則以術爲文，相如子雲則以形似爲文，六朝齊梁則以聲色爲文，昌黎韓愈則以氣爲文，而襄陽杜甫乃以神爲文，文體雖不同，子美之所得，固無愧於古人，且有突過於古人者，沈鬱頓挫，自謂過之，非妄語也。杜詩之精義，後世固有知之者。嚴羽儀卿論詩曰：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惋，其大致有二：曰優遊不迫，曰沈著痛快。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儀卿知之，而言之不詳，且以李白對舉，易惹起文學史中之李杜優劣論，吾不取也。今秋都講國立四川大學，有專家詩一課，專講杜詩，因刺取各家箋杜之長，斷以己意，補苴發皇，勒爲述抱負，明興寄，探義蘊，究聲律，參事實，討警策六目，而顏其篇曰杜詩精義。杜詩固有精義，說者或得其粗，是望國內學人詩家之賜爲糾彈而